桑兵的另一本书，书名与本书的副标题只相差一字，题为《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》，不过内所收录文章大不相同，倒不是“排列组合又一书”的成果，只能说，作者的学术兴趣大致集中于此，故所撰文章多可以此类似主题涵盖。

大概是不对眼的缘故，笔者并未通读本书，只截取了包括绪论在内的数篇文章读过，但也没有一一细读，故以下评论只是从笔者仅有的感受出发，若有谬误，责任全在笔者。

从本书来看，作者的兴趣基本上放在了学术界上，关注的是晚清民国学人的所思、所想。不过这里有一个不算严重，但极影响文章是否能够上一层的问题，作者往往只在思想的外缘活动，并不深入其中，重点是“活动史”而非“思想史”。这从作者行文最常引证的史料来源也可一窥，作者往往引用的是诸如时人日记、评论、序言，较少从所论学人的文本出发，更不要谈把握其思想的精义。不过文章的一些最基本价值还是扎实的，如《“中国哲学”探源》为读者提供了“哲学”一词由日本进入中国学界并最终得到广泛使用的较详细经过；《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》则谈论了教会学校对待中学、西学的态度。

从书中不难看出，作者对于陈寅恪是极推重、极钦慕的，似乎没见写过一句“不好”的评价。但作者大概只是从其学术上的成就推崇其人，却与个人的学术、思想志趣无关。一是作者并未承接、学习陈氏的学术方法，也谈不上将其吸收、转换后用在近代史的研究中；二是作者停留于思想外缘的方法，也意味着作者本人对于陈氏的思想（如其关于中华本位的叙述）是有隔阂的，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与陈氏并不能做到思想上的接近（所谓“了解之同情”）。这里用本书论述陈寅恪的两篇文字《陈寅恪的西学》、《“了解之同情”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》与余英时的《陈寅恪<论再生缘>书后》做一对比，本书善于引用陈氏的序言和他人的评论作为证据，但余文则径取陈氏之文字加以推敲，论学人之文章近学人之方法，从思想与方法上贴近所论之对象。相较之下，本书不免令读者油然生出隔靴搔痒之感。

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，作者也未能达到圆润的境界。这里举绪论中的例子，正文由于主题明确、目的清晰，作者往往单刀直入。但在绪论中，大概是作者没有一个明确的图景、定位不清，因而东扯西拉，令读者半天找不到主调，这对于为全书定下基调、升华主旨的绪论来说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二是或许由于这是绪论而非正文的缘故，作者在考证不明的情况下纯就个人印象行文，犯了个人主观情绪影响判断的错误，如作者怀疑钱穆讲学极受欢迎一事多半出自其自吹自擂，这实在是作者“读书不多”。试举萧公权的《问学谏往录》做旁证，萧书提及，在担任“中央训练团”的教员中，据说钱宾四最受学员的欢迎。这些学员还只是军人而非学生，故可见一斑。

至于有些读者评价作者的“文字繁复拖沓、间引名家一二真言、又枝节横生、逻辑断篇、终至匆匆结尾，使人掩卷茫然”、“多在抽象的对立名词之间打转”等问题，笔者感受并不明显，或是读者读书不细，或者作者已有所进步。本文实无意写成一篇批评文章，只是阐发读后感想，奈何成色如此，欲下笔称赞，却不知从何入手，这都要怨怪笔者的驽钝了。